

《花煞》與當代文學 對基督教的再認識

王列耀

暨南大學

中國廣州市暨南大學中文系

《花煞》是中國當代中青年作家葉兆言的一部長篇小說，已連載於1993年至1994年的《鐘山》雜誌。

一 《花煞》的選材

《花煞》的特別處，首先表現在作者獨特的選材，《花煞》是一部以中國晚清時期發生在長江中下游的一次教案為題材的長篇小說。

自從1840年後，隨著西方軍事勢力與經濟勢力的入侵，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非常沉痛又非常矛盾的時期。曾幾何時，救亡與啟蒙，成為這個時期被人注目的中心。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痛感在西方列強的軍艦、大炮當前，若不奮起圖謀反抗，中國將被侵略者任意宰割。而較深入地接觸西方思想，又能在「軍備」之外，深究「立人」的中國知識分子，則在探討著一條被認為更重要、更艱巨的救亡之道——思想啟蒙。

文學是人學，必然地要反映人在社會中所遭遇的重大矛盾、危機，甚至困惑。更由於近代以來，梁啟超對文學的社會作用的極度重視與推

崇，中國近現代文學的主要熱點，也必然地圍繞著社會的主要矛盾、危機與熱點——現實的救亡與啟蒙鬥爭。

也許，正是這樣，教案——在中國近代社會曾經此起彼伏，發生過大大小小數百次的問題，未能直接、正面地進入文學的範疇。

未能直接、正面地進入文學的範疇，並不意味著教案完全與文學絕緣。而是意味著此時的文學，在直接、正面地解釋與再現教案——這一客觀生活之外，仍以各種方式與這一客觀生活保持著接觸。

其一，側面描寫的方式。

每一個教案的發生、發展與結束，都牽動著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草民百姓。並且，不但涉及衝突中的中國民眾、西方傳教士和中國教民。又由於，每個教案在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均顯出異常複雜的狀態。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發生的教案；甚至在同一宗教案中，其起因、發展與結局亦極為錯綜複雜。全力以赴於啟蒙、救亡的近現代作家，由於歷史的原因，未能來得及深入、正面地探究與解釋每一個教案，或者某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教案。也來不及全面、直接、正面地用文學的方式再現或者表現各種教案，甚至某幾次教案。

因而，在文學中，人們看到的多是以背景出現，或者以短暫穿插式或零敲碎打式的對教案的描寫。又或者，像《死水微瀾》那樣，對教案餘波式，以及「邊緣」式的描寫。比較完整，且以正面契入方式，再現或者表現具體教案的長篇小說，則極為少見。

其二，漫畫式描寫的方式。

在近代文學中，不僅對教案的正面、直接反映、表現較少；對有關基督教在中國的情形，也缺乏正面、直接的描述和反映。

一方面，出於高漲的民族激情；另一方面，也出於儒學正傳的需要；近代時期的文人士子，在表現、反映外來文化——基督教時，必然亦要從儒家的思想與倫理標準出發。

好像魯迅說過的：

因為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健康，我偏生病……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¹

由於有意與「洋教」唱反調，文人士大夫把漫畫的藝術手法，相當程度地運用在自己的描述和記敘文中。而且，很顯然，有許多情節與細節，都是以想像作基礎，以誇張和漫畫為技法。

在近代史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例子。如下述頗具故事性情節的記敘，便見到想像、誇張，甚至杜撰的特點。

近日夷人陽謀詭術，設計害人，指不勝數。茲建立福音堂，禮拜堂，欲煽動婦女進教行姦……假扮道士，或令嫗婦混入他鄉，妄說時症將臨，設施毒藥，名為神仙粉，均派各鄉婦女，令其將此毒藥混同米粉，和勻發糕蒸熟……如此，實令婦女一入其教，任他肆行姦淫而已。²

又如下述詩歌：

番奴屢日毒心狼，
立起邪心落四方。
話多仙粉隨街派，
毒藥將來害女娘。
男婦食吞膨腫脹，
半年之內見閻王。³

顯然，一般的鄉民，不可能有如此的文字與文學能力。正是文人士子，不僅將方士之術與耶教合二為一，還動用了想像與聯想、附會等漫畫式方法，甚至將晚清時盛行過的邪狎小說的藝術手法，也運用在其中了。

¹魯迅：《且介亭雜文》。

²《近代史資料》總62號，第25頁

³《近代史資料》總62號，第25頁

不論是側面描寫方式，或是漫畫的描寫方式，都顯示出兩個相似的藝術思維特徵：1.角度單一，基本上均是採用單面鏡的方式，從外部觀察，而不是既能真正深入其中，又能出乎其外地多角度觀察與反映複雜的新現實。2.「話語」單一，或者進一步地說，是「話語」的情感色彩單一。作者多是先行預定了強烈的情感，或憎惡、或指斥或痛恨，方進入創作活動。因而，心靈話語的激越色彩，轉化為畫面話語後，激越而非冷靜，便成為「話語」的基本面貌。

歷史由近代向現代、當代不斷發展。中國社會、中國文學對基督教的認識也起了較大變化。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中間國著名作家，都從基督教文化中汲取過養分，並且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充分展示出文學大師的包容性。許地山、冰心、曹禺、老舍等作家，則在自己的生命歷程與文學歷程中，都受過基督教的極大影響。他們中有的作家，甚至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傳達出與中國近代文人完全不同的一種信念，一種不是反對、漠視、仇視基督教的思想，而是親和、學習，甚至追尋基督教思想的傾向。冰心的《一個不重要的軍人》，許地山的《玉官》等小說，都是這方面的例證。

但是，由於中國近現代社會思想主潮依然圍繞著啟蒙——救亡這一旋律而波動，不論是反對或是親和基督教思想的中國作家，都來不及或說顧不上對教案這一歷史現象本身作出正面、直接的反思、反省直至再現與表現。因而，當代中青年著名作家葉兆言的長篇歷史題材小說《花煞》一面世，便因其選材的特別性，引起了關注當代歷史研究與當代藝術思維走向的思想界與文學界的注視。

二《花煞》的「話語」特徵

《花煞》的主要情節，乃是圍繞清末在長江中下游一小城鎮——梅城縣所發生的教案而展開，描寫了教案的起因、經過、結局。並且，通過對各種人物形態、心理的活動，複雜、具體的解釋、描繪，表達出作者心靈「話語」的獨特與敘述「話語」的複雜。

文學在反映生活的進程中，「話語」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話語」表現為文學家的一種內在思維活動，姑且稱為內在的「心靈的話語」，也就是文學家的思維特性與方式的內在軌跡。其次，「話語」又是人的心靈活動的必然性的外在顯現；因而，又是心靈話語的書面化顯現。所以，文學中的「話語」，起碼包容了作家的思維的內在密碼與外觀表現方式。

《花煞》的作者，在正面、直接地將目光投射於教案這一歷史現象之時，便力圖使自己在「話語」方面，有所創新與變化。故而，在心靈話語方面，作者力圖擺脫種種「先驗性看法」，力圖將單向鏡——外部觀察與漫畫式思維的方式，轉化為多向鏡方式，即內在式的、具體案例具體分析式的「唯物」「還原」式思維。在敘述話語方面，作者則力圖把握生活的原生態，或者說是作者用多面鏡所觀察與了解到、意識到的原生態。

具體到作品的情節與內在發展軌跡來說，作者力圖以前所未見的複雜方式，將心靈話語轉化成一種異常複雜的矛盾性生活。也就是，展現在作品中，那些令人無法釋懷，又啟發人深思的兩大衝突。

兩大衝突，即民眾與教會、教民的衝突，以及民眾與官方的衝突，是教案的發生、發展、再發展與結局的主要原因。

首先，民眾與教會、教民的衝突，是梅城教案發生的主要原因，也是事態惡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作者在描述事件的這一主要原因時，既同於前人又不同於前人。他從三個方面，向讀者展示形成這一趨勢的內在動因。

內在動因之一，中國民眾對教民，主要是對吃教、混教的教民有強烈不滿情緒。譬如：

平湖村本來有一個最小的土財主，根本就沒有甚麼思想信仰，只因看見親戚入教得了好處而入教——「目的自然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為了擴展自己的利益。「為祖墳前的那塊地，和人爭執

起來，要說道理，土財主明顯有幾分不是，打官司到縣裏，土財主那在城裏的那位親戚托文森特神父到謝知縣那去打了個招呼，結果竟斷土財主贏了。土財主贏了一場官司，嘗到了入教的甜頭，便想在村裏稱王稱霸起來」。

梅城中的第一家教民楊希伯，比土財主更囂張與無理。「他和那位叫文森特的神父來往密切，連縣太爺有時也奈何不了他」。因為他第一個入教，並濫用了教民的身分，更因為文森特神父在明裏暗裏對混教者的偏袒，楊希伯從三十年前的窮光蛋，變成了梅城的富戶，變成了危害民眾的害群之馬。他在聚斂財產的同時，還因「過分的好色得罪了不少人，知道自己睡過了太多別人的老婆，今天是他得罪過的那些人來找他算帳的日子」。

可見，由於教會中的某些人在梅城縱容教民——吃教與混教的教民，更由於土財主、楊希伯之流心不在教，以身壞教的中國式吃教、混教，其劣行惡跡，惹起了民眾的不滿與忿恨，使得教案必然發生。

內在動因之二，中國民眾本身的愚昧與失控。

有壓迫必有反抗，這是中國歷史上多次驗證過的事實。受到壓迫與欺負的中國民眾，在忍無可忍之時，挺身而起應是合情合理之事。然而，葉兆言顯然從魯迅描寫辛亥革命時中國民眾革命的「壯舉——阿Q式的革命中受到啟示，即本來應該在合理的道路上反抗的民眾、革命的民眾，因為本身的愚昧、失控，使反抗與革命，成為愚昧的反抗，成為失控者的又一種暴行。

愚昧的表現，亦有多種。第一種愚昧，是近代時期，由文人士子用漫畫式的宣傳，灌注而成的民眾的愚昧——對基督教的誤解：

「洋人假稱傳教，其實只是為了拐騙男女幼孩，吸取精髓。對婦女則不管妻妾老少，一概姦淫」。「洋人挖了人的心肝，熬成了油，然後用熬的油點上燈」。「中國人的眼睛也可以大派用場，用以點鉛成

銀」，「將人的眼睛和草葯，加上女人的經水，還有胎丸配在一起搗成糊狀，塗在玻璃上，這就成了照人『眉目絲毫盡肖真』的快鏡，常人被它一照，魂就被勾了去」。

俗話說，冤有頭債有主，農民的反抗本來是衝著不公平的某神父與混教的某教民。但是，反抗者，並不完全了解自己反抗的對象，以致變成被愚弄者——被漫畫宣傳所愚弄了的民眾。把一場主體應是被壓迫者的反抗，演化為一場愚昧者的反抗。

第二種愚昧，是來自農民本身的愚昧。「胡大少的人馬都是梅城中的下屬百姓，中間不乏雞鳴狗盜之徒」。也就是說，與混教、吃教的教民相對立者，不乏混混教、吃吃教的非教民。阿貴因為老婆勾引別的男人而成為打教者，矮腳虎因為自己喜歡賣弄風情而變成煽動者，二呆子純因鬥氣而與人打鬥……更有首領者胡大少，為了勾引裕順媳婦，才將指揮部與躲避處選擇於春在茶館之中。乘機發財、偷盜、沾光，或猶如阿Q式革命者，便更不在少數。魯迅在阿Q時代，清醒地描寫出國人，尤其是農村中封閉的農民的愚昧；葉兆言在《花煞》中，則大膽地描寫出前阿Q時代，農村中農民的多種愚昧，即使在反壓迫的鬥爭中，同樣暴露無遺了其局限與愚昧。

內在動因之三，是官府對可能發生的教案的既怕又縱容，明禁暗允許的態度。

朝廷處於無奈之時，與各國政府會談、協商，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讓。然而，在談判桌上的一套，並非是他們心中思忖的那一套。作為下級官吏，當然要充分體會最高統治者的主觀意圖；並且，以此為依據見機行事。於是，風雨未來之時，官府也曾讓文森特神父風光一時；風雨欲來之時，官府便派蔣哨官之流去武裝保護教堂。但是，官府又通過朱師爺向胡大少交底：「只要不燒教堂不殺洋人，今天怎麼痛痛快快地大鬧都可以」。

官府保教堂，實在還是為了保住官員頭上那頂烏紗帽。官府懲愚民眾打教民、殺教民，一是為了「拿教民煞煞氣」，二則是以為如此算盤對頂上的烏紗帽的牢固性更加有利。意料之外的是，由愚昧之眾、烏合之眾為主體的被懲愚者，一旦燃起仇恨之火，便無人可以駕馭與阻止。胡大少、楊氏二雄指揮下的大軍，在殘酷地實施完官府希望的一步——打殺中國教民：包括搶、殺、砸、強姦、輪姦之後，便無可阻擋地走向了官府所不希望的第二步——燒教堂、殺洋人。

至此，民眾與官方的衝突，也就是闖了禍的民眾與為在西方列強面前洗脫責任的官府的衝突，便轉而成教案再發展與最終結局的主要矛盾。

在官府懲愚的這場愚昧的復仇之火中，死幾百、幾千中國教民與非教民都是無甚重大的問題。但是，殺洋教大軍還逼死了兩個「洋人——文森特及其女友澳夫娜，又殺死了兩個「洋人——安教士夫婦。一場「安內」的計劃，就因擴大化而引來了列強的報復。在武裝的洋人面前，在軍艦進駐天津；開進長江之後，朝廷便抹下臉收拾掉幫了倒忙的下級官吏，更派出大軍剿殺民眾——曾經因愚昧而打過教的民眾和不曾參與，甚至並不知曉此事的民眾。

一場轟轟烈烈的打教運動，轉眼之間變成了由官兵加入的打「打教運動」，打民眾運動。姚統領帶著本應御敵於國門之外的剿民之軍，首先大開殺戒——繼承打教之殺、盜、搶、姦之風，且將此風推向極致。只不過，殺、盜、搶、姦的對象不是教會，而是打過教會與根本沒有打過教會的一般民眾。接替了舊知縣大印的儲知縣，緊接著上演著另一齣「文戲——在打、殺之外，以新的方式、新的手段榨取民財。

於是，在一場野火一樣的打教、打打教事件之後，教會與反教會的雙方都屍橫遍野、遭盜、遭搶、遭殺、被姦。惟有朝廷與試圖染指中國的西方列強，恰如觀看鬥爭的主人，或者恰如羅馬時代觀看奴隸搏殺的奴隸主，雖為台下的輸贏得到與失去了少許利益，卻不妨大度地握手言和，並開始盤算下一次賭博的地點與方式了。

三 《花煞》中衝突者的各種矛盾

葉兆言所重視和正視的，不僅在教案發生、發展過程中，民眾與教會、民眾與官府兩大衝突的轉化；而且，還在這轉化的過程中，深入、獨到地解釋了以前的文學作品所未注意，或者是不願注視的五項矛盾。

其一，打教的民眾的內在矛盾。

轟轟烈烈的打教事件，其主體是由不滿和憤怒而聚集，以及由無知而聚集的民眾，這些民眾從試圖有秩到全面無秩，從狂熱到獸性，除了愚昧無知之外，更有因「烏合」而引發的種種矛盾。

胡大少心不在打教，乃在借打教與逃避打打教，霸佔有夫之婦。而胡大少被囚之後，一批「義士」借為胡大少捐錢「留種」之名，大肆招搖撞騙發難民財是真。曾經率領民眾衝進楊希伯家雪恥的楊氏二雄；一個被自己的妻子送進了官府，另一個則被自己的族人送進了官府。

其二，官府的內在矛盾。

在封建統治者內部，從京都到地方，全都只顧自己的利益。在西方武力逼迫稍有鬆動時，最高統治者默許，甚至首肯下級官吏的懲愚民眾反教行為。每當西方列強乘機要挾時，下級官吏便成為替罪之羊——董知縣、霍管帶等便只好被流放新疆。

其三，朝廷與西方列強的矛盾。

在朝廷與列強之間，教民與反教的民眾只不過是爭奪利益的棋子。朝廷多為統治的穩固，列強均為逼迫朝廷作出利益上的退步。因而，一有教案，「大英帝國的軍艦」，就「像候鳥一樣駛往天津口岸」。「在清政府簽訂了一張喪權辱國的條約之後，又一次像候鳥來時一樣，得了便宜見好就收一哄而散」。

其四，教會、教民的內在矛盾。

《花煞》與此前有些作品以外在視點描寫教會教民的方式不同，它試圖將觸角伸進教會之內，如實而又客觀地面對並反映教會之內的種種矛盾。

同是中國的教民，信教的與混教的存在著天壤之別。楊希伯雖是梅城第一教民、第一富戶，但是第一混教者、第一無賴。同為中國教民，且由僕人進而神父的洪順，則是梅城第一忠誠的信教者，是在生死關頭捨身為主、為教、並悲慘獻身者。發現、鞭撻楊希伯這樣的敗類，在中國文學中並不少見。像《花煞》，塑造一位洪順這樣的虔誠而又捨身的中國教民的作品，實還少見。

同是西方傳教士，同樣也有橫行霸道與以愛待人的巨大差別。文森特神父曾因給土財主、楊希伯之類提供特權與暗中撐腰，而背離了基督教愛人如己的教訓。新來的普魯修教士則「不僅表示了要對中國政府尊重，而且流露出對罪犯赦免的願望」。

可見，葉兆言對基督教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中國傳教士、中國教民都有深入的認識，並有自己獨到而不從俗的見解。

其五，教會與列強武力的矛盾，與乘機起哄的西方人的矛盾。

基督教在近代重新入華時，曾經借助過西方的武力。但是，基督教在中國土地上生存之後，與西方武力的目的並不一樣。於是，分歧便在所必然：

「傳教士在一個古老的東方國家傳播上帝的福音，要想使美麗的長江黃河成為十字架使者們的康莊大道，就不能過分地使用西方帝國的強權」。「既然基督教以仁為本，殺戮只能引起中國人對上帝的誤會和憤怒」。

《花煞》的深刻之處，還在於通過梅城教案，描寫出血與火的屠殺，再屠殺之後，得益的除了列強政府，便還有一些乘機來華起哄騙人的西方人；教民與反教的民眾，只不過都是同樣的受害者。

當新來的普魯修教士反對官府殺人，且在「成群結隊的農民中，開創了他貨真價實的事業」，「作為一名穿著黑布中國長袍的慈善家」，「一鍋接一鍋的熬著粥」救濟形容枯槁的饑民時，哈莫斯——一個只樂於與中國地方官員打交道，且無真才實學的西方人，一方面用煽情的文字叫囂對付中國人：「不是傳教，而是派出更龐大的艦隊」；另一方面，鑽營於腐敗的中國官府借機大發橫財。作者指出：

「有趣的是，作為最爾虞我詐的官場，即使對哈莫斯產生了懷疑的時候，仍然一如既往地把他當作貴賓來接待。這種寧願被騙，也不願承擔冒犯洋人的風險的普遍作風，大大方便了哈莫斯的肆無忌憚到處行騙」。「熟悉中國官場黑暗的哈莫斯充分地利用了這一致命弱點」。
《花煞》在描敘了血與火的場面之後，便用了整整一卷的篇幅解釋教案的另一種得利者——西方的某些別有用心的人。

《花煞》的面世，顯然是葉兆言的一次主動選擇與大膽嘗試。

在這種大膽的嘗試中，作者試圖以個體的方式、歷史的方式，以人為觀察對象的方式，重新審視已經過去了的複雜的人與複雜的事。作為一部長篇小說，《花煞》在藝術上還算不得非常完美。但是，《花煞》的功績則在於使讀者在閱讀之後，頭腦與心靈不得不變得更複雜一些。並且，《花煞》也給教案題材的文學作品，啟示著一條以複雜代替簡單、以冷靜代替激越的多向性思維之路。

註：文中未標明出處的引文，均出自《花煞》。

撮 要

本文指出，由於中國近代社會思想依然圍繞著啟蒙——救亡這一旋律而波動，不論是反對或是親和基督教思想的中國作家，都來不及或顧不到對教案這一歷史現象作出正面、直接的反思。因而，當代中青年著名作家葉兆言的長篇歷史小說《花煞》面世時，便因其選材的特別，引起了人們對當代歷史研究與當代藝術思維走向的注視。葉兆言試圖以個體、歷史，以及人為觀察對象的方式，重新審視已經過去了的複雜的人。《花煞》也給教案題材的文學作品，啟示一條以複雜代替簡單、以冷靜代替激越的多向性思維之路。

ABSTRACT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thinking still encircles around and fluctuates along the "Enlightenment-Salvation" theme, therefore Chinese writers, whether for or against Christian thought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of "Missionary Incidents" (教案). A contemporary, young, Chinese writer, Yieh Chou Yen (葉兆言), writes a long historical novel, entitled *Hua Sha* (《花煞》), that depicts this phenomenon. The novel has gain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scholarly and literary worlds, who have historical and artistic interests. Yieh attempts to look anew at the complex, controversial narrative and event from the individual, historical and humanistic perspectives. *Hua Sha* is an artistic, literary work that reveals multi-track thinking, such thinking proposes complexity rather than simplicity, calm analysis rather than impulsive passion.